

# 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聖言、聖神傳教會與「新莊輔仁大學」

雷俊玲

## 一、前言

中國教會大學長期被看做是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堡壘，曾引起眾多中國人士的反感。但是，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這種反感雖不無依據，但卻失之籠統與偏頗。因為它沒有將教會大學做為主體的教育功能與日益疏離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區別開來，也沒有將學校正常的教育工作與西方殖民主義的侵華政策區別開來。

事實上，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中國教會大學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它的發展變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的過程中具有某種示範與引導作用。因為它在體制、機構、計畫、課程、方法乃至規章制度諸多方面，更為直接的引進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影響深刻。教會大學中具有專業素養的西方神職人員與中國師生長期直接的接觸，對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會有較多認識，在耳濡目染之下，思想自然較為活潑而多元。

本文試圖經由分析輔仁大學的學風、藉著德國傳教會——聖言會（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SVD)）和聖神會（the 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SSpS)）外籍教職員在新莊輔仁大學的實際經驗，看西方文化如何影響近代臺灣高等教育。

## 二、輔仁學風的形成與內涵

輔仁大學是一所羅馬教廷創辦的大學，中國天主教知名人士馬相伯、英斂之先生積極參與和推動了創校工作。<sup>1</sup>自創辦之日就有自己鮮明的辦學特點。

---

<sup>1</sup> 馬相伯（1840-1934）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驅人物，震旦、復旦大學的創辦人，曾一度代理北

1912年馬良（相伯）、英華（斂之）聯名上書羅馬教廷，請求在中國創辦天主教大學。在〈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中，認為在中國傳教，利瑪竇時代用學術來擴大宗教影響的辦法是非常成功的。希望教廷「多遣教中明達熱切諸博士，于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創一大學，廣收教內外之學生，以樹通國中之模範。」<sup>2</sup>這封上書著重點在於強調要繼承利瑪竇、湯若望開創的傳統，傳播西方科學文化，研究中國學術，溝通中西文化，並且協助中國面對現代化新世界的挑戰。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沒有得到回應，但是馬、英並沒有就此做罷，1913年英斂之在北京香山靜宜園創辦「輔仁社」，專為教內子弟傳授國學。他希望西方天主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培養中國天主教人才，實現中國天主教的中國化、本地化。「輔仁社」和〈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的創辦思想一脈相成，雖然僅維持了四年，於1917年7月隨著英斂之發表〈勸學罪言〉一文後宣告停辦。<sup>3</sup>然而在創辦過程中重視和發展國學、介紹和引進西學、提倡中西文化交流、不拘一格延攬中外文化菁英的辦學方針，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輔仁學風。

1924年3月北京公教大學的首任校長奧圖爾（Rev. George Barry O'Toole, O.S.B.）給英斂之的一封信中說：

我們希望北京公教大學成為一個中國文化的儲聚點，一個中國文化的中心，並通過自己特有的天時、地利，將其發揚光大，有助於中國這一強大古老的國度發展自己的藝術、語言、哲學等。<sup>4</sup>

1925年9月馬相伯、英斂之起草的〈美國本篤會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一文中說：「今本會創設大學於北京，……即介紹西歐新得科學文化之最精者，

---

京大學校長，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情懷。英斂之（1867-1926）創辦〈大公報〉，以敢言之名，譽滿全國。

<sup>2</sup> 馬相伯、英斂之，〈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收入方豪編著，《馬相伯先生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民61），頁23；孫邦華編著，《輔仁大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6。

<sup>3</sup> 參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1967），第三冊，頁309-310；方豪，〈民初馬相伯、英斂之、陳援菴三先生的交往〉，《東方雜誌》，第六卷，第八期，頁28。

<sup>4</sup> 轉引自林智源，〈輔仁學風與中西文化——概述北京輔仁大學的外籍教職員〉，《學風與傳統學術研討會》，2005，頁30。

並保存中國舊有文學美術之最善者，舍短取長，不使偏勝。」<sup>5</sup>具體揭示辦學宗旨，獲得美國本篤會的認可和同意。1927年北京公教大學決定以輔仁二字命名，將大學更名為北京輔仁大學。<sup>6</sup>「輔仁」者，取自《論語·顏淵》中的「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就是要保存國學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意思。「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實質上可以看做是北京輔仁大學的校訓。

1928年「私立北平輔仁大學組織大綱」正式定稿，文中第二章宗旨「本大學以介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養成碩學通才為宗旨。」<sup>7</sup>而1929年11月13日在北京輔大教學主樓開工奠基典禮上，教廷駐華第一任代表剛恒毅樞機主教（Archbishop Celso Costantini）<sup>8</sup>致詞時提出輔仁大學的建校目的：

.....輔仁大學是保持完整中華文化的有力工具，正如教宗庇護（碧岳）第十一（Pius XI）曾以莊嚴的語詞所說的：「輔仁大學擔負著中國新生的使命。」.....輔仁大學是以「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原則來推動中國文化，裨益大眾。.....輔仁大學的創設也比做一個精神性的氣象台，其本身不僅是科學性的建造，而更是建立在教會的基本信條與倫理道德上，其成果是一種無形的偉大力量，此力量足可以改變世界與創造新局面。<sup>9</sup>

可見剛恒毅樞機主教對輔大的期許有多麼的深厚。

1933年5月20日聖言會總會長葛林德（Fr. Joseph Grendel）寫信給陳垣校長，告知聖言會已同意於新學年開始接辦學校。他說到聖言會：

接受這個重責大任，唯一的目標是希望透過這個學術機構能復興中華民族自遠古累積至今深厚豐富的文化，而這也是聖父（教宗）在他給我們的信

<sup>5</sup> 英敏之、奧圖爾，〈美國本篤會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輔仁生活》，第四期（1940年2月25日），頁12。

<sup>6</sup>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一九二五至一九五二）》（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頁3。

<sup>7</sup> 「私立北平輔仁大學組織大綱」，私立北平輔仁大學校史檔案總類，輔大校史室。

<sup>8</sup> 剛恒毅樞機主教於1922-1933年間為教廷駐華代表。他以推行「本地化的傳教」（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時要因地制宜，使教徒適應華人社會文化）及發展中國基督教藝術聞名。

<sup>9</sup> 張振東、李貴榮譯，〈輔仁大學的建校目的——剛恒毅樞機的演講詞〉，收入輔大編輯委員會主編，《輔大五十年》（新莊：輔大出版社，民68），頁39-41。

中所諭示的想法。<sup>10</sup>

1948年8月學校給董事會的報告中指出：「本校創設，以發展中國文化，介紹世界知識為宗旨，本近代教宗愛護中華之至意，發揚天主教以學術傳教之使命，其將來建立基督化之新中國。」<sup>11</sup>則是輔仁建校廿三年後，再次以更周延的文字，闡釋輔仁一路走來的辦學宗旨。

綜上所述，輔仁學風的表述和內涵似可概括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重視和發展國學，介紹和引進西學，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學術輔仁，培養和造就國家所需之碩學通才。

在輔大校友們和于斌總主教的多年積極努力奔走之下，教廷終於首肯，1961年輔仁大學在新莊復校，繼承北京輔仁校名與其創校精神。校長于斌總主教規定校訓為「聖美善真」。為校歌填詞時，他寫下了這樣的字句：吾校之魂，聖美善真；三知是求，明德日新；蔚起多士，文質彬彬；福音勤播，神旨永遵。<sup>12</sup>來說明輔仁的教育目標和教育使命。1963年11月新莊輔大大學部開學，校長于斌總主教自羅馬返台，在文學院大講堂訓示，其記事本上清楚說明輔大的辦校方式：

輔大為有歷史之大學，精神遺產彌足珍視：a.精神：愛的教育乃天主教的精神；仁者愛人；b.校風：勤樸；c.教與學的態度：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sup>13</sup>

于斌校長於1971年6月7日在《私立輔仁大學概況》一書前言中指出：

故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曾指出決定輔仁復校之動機，乃對我國儲育人才，重建大陸，作具體之貢獻。現任教宗保祿六世於前年剴切訓諭，輔仁大學應負起以天主教精神重振中國倫理道德，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之責任。是賦

<sup>10</sup>1933年5月20日，葛林德致陳垣及英千里函，聖言會檔案（檔案編號7086-89）。轉引自柯博識，〈聖言會於一九三三年接辦北京輔仁大學之紀實〉，《學風與傳統學術研討會》，2005，頁65。

<sup>11</sup>「輔仁大學最近情況」（1948年8月），私立北平輔仁大學校史檔案總類，輔大校史室。

<sup>12</sup>李震，《天主教輔仁大學的精神傳統》（台北：輔大出版社，2001），頁3。

<sup>13</sup>陳方中，《于斌樞機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頁233。

輔仁以鎔中西道統於一爐，為人類開創新境界之使命。今日輔仁，亦惟有懸此為設校之最高理想。<sup>14</sup>

輔仁的最高理想是將中西道統鎔於一爐，不但要發揚中國固有文化，更應將西方先進思想傳播進來，而承擔此一使命的重要靈魂人物就是外籍教職員。

### 三、聖言會團體與新莊輔大

十九世紀末，德國在俾斯麥統治下，宗教活動受到諸多牽制。因此，楊生阿諾德神父（Arnold Janssen, 1837.11.5-1909.1.15）於 1875 年 9 月 8 日在德國和荷蘭的邊界，史泰爾（Steyl）創立聖言會(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進行傳教工作。創會始祖楊生神父曾說：

一個神父聖召的恩寵是在教友家庭的懷抱裡慢慢成熟、茁壯。大體來說，神父就像是慈祥母親的苗裔，母親的祈禱和聖德蘊育了她們兒子所獲得的恩寵。……因此，很明顯，外方的傳教需要有許多熱心的母親，也因此，只有修女們最能實現此事。<sup>15</sup>

修女們比神父和修士們更容易接近，因此容易影響外教婦女。於是在 1889 年 12 月 8 日<sup>16</sup>楊生神父又增創傳教女修會——聖神婢女傳教會(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簡稱聖神會 SSpS)，其工作即在支援神父們，補助宣揚福音。

此後，聖言會團體不斷發展茁壯，1879 年派遣第一批傳教士遠赴東方的香港傳揚福音。1895 年第一批聖神會修女首次離開歐洲前往外地傳教，首途為阿

---

<sup>14</sup>于斌，〈前言〉，《私立輔仁大學概況（六十學年度）》（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60 年），頁 1。

<sup>15</sup>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天主教聖言會，1996），頁 150。

<sup>16</sup>聖神會創會日期有三種不同說法。一為 1889.12.4。見羅伊泰著，薛原譯，《聖言的傳播者——真福楊生神父傳》，頁 3；另一說為 1889.12.7。見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152；第三說為 1889.12.8。見薛保綸神父，〈會祖真福楊生·愛諾德神父的生平事功〉，收入《聖言會的軌跡》（財團法人天主教聖言會），頁 9。「他對聖母瑪利亞特別敬愛。……聖母聖誕瞻禮是聖言會的創會日，聖母無原罪瞻禮是兩個聖神修女會的創會日。」見羅伊泰著，薛原譯，《聖言的傳播者——真福楊生神父傳》，頁 95。因此聖神會創會日應是 12.8

根廷。數年後聖言會團體就傳佈到世界各地。繼之，在會士工作的地區有不少的青年男女加入修會的行列，修會遂在穩定中逐漸的發展，形成一個國際性的修會。<sup>17</sup>

1961年輔大在台復校委託中國聖職、聖言會、耶穌會和道明會（後來退出）聯合承辦。這跟以往由本篤會或聖言會負責的北平輔大，情況極為不同。三個如此不同的團體合作來辦大學，這是個創舉，但三單位合作良好。此舉舒解了各團體財務上的負擔，也減輕了人才上不足的困難。<sup>18</sup>復校時擔任主任秘書的龔士榮神父也指出：「幾個單位在一起合作，他們在羅馬簽了一個協定，……要求自治……人事和經費是獨立的。」<sup>19</sup>同年7月7日由董事會第二次會議決議中國聖職負責文學院，耶穌會負責法學院，聖言會負責理學院和外語學院。<sup>20</sup>據聖言會孫志文神父（Fr. Arnold Sprenger）寫給裴德修女（Sr. Agathe BramKamp）的信上指出：

最初似乎打算由方濟會來承辦外語學院，當他們拒絕後，聖言會的總會長舒德神父（Fr. Johann Schütte，任期1958-1967年）要求聖言會承擔這項挑戰。在很短的時間就將未來英語、德語、法語、西語等系的師資，組織起來並加以訓練。我個人也接到舒德神父的委派去研習德語和語言學。<sup>21</sup>

1960年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任命蔣百鍊神父（Fr. Richard Arens）為聖言會團體開辦理學院及外語各系的負責人。在三單位「分地設校」、人事經費獨立

---

<sup>17</sup>聖言會於1882接管山東南部的傳教工作；1889遣發傳教士到阿根廷；1892年至多哥；1895至巴西；1896年至新幾內亞；1900年至智利；1905至美國；1906至日本；1908至巴拉圭；1909在創會始祖揚生神父去世的這一年，傳教士已達菲律賓。見薛保綸神父，〈會祖真福楊生·愛諾德神父的生平事功〉，收入《聖言會的軌跡》（財團法人天主教聖言會），頁10。聖神會至各地傳播福音建立分會時間如下：1889 Steyl, Holland；1895 Argentina；1896 Togo, Africa(until 1918)；1899 New Guinea；1901 U.S.A.；1902 Brazil；1905 China Mainland；1908 Japan；1910 Holland；1912 Philippines；1912 Austria, North Germany；1917 Flores, Indonesia；1921 Poland；1921 Timor, Indonesia；1925 Java, Indonesia；1929 Germany, South；1931 Slovakia；1933 England；1933 India；1934 Chile；1937 Rome, Italy, Generalate；1940 Australia；1942 Switzerland；1945 Ghana, Africa；1948 Italy, North；1951 Spain；1952 Paraguay；1953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見《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廿五週年紀念》，頁17。

<sup>18</sup>飽乃曼著，薛原、潘薇綺譯，《聖言會在華傳教小史》（天主教聖言會，1999），頁87。

<sup>19</sup>邵台新，《龔士榮神父訪問記錄》（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民89），頁79。

<sup>20</sup>薛保綸，〈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收入《尋美之旅》（新莊：輔大，民93），頁354-355。

<sup>21</sup>轉引自裴德修女，〈輔大德文系：服務與學習之泉〉，收入《尋美之旅》，頁193。

的原則下，聖言會邀請聖神會修女參與復校工作。1963年10月14日在聖言會的邀請之下，四名修女抵達輔大校園，開始協助輔大復校的使命，有如雙方在北平時期的合作一般。<sup>22</sup>在學校的行政及名稱上，聖言會和聖神會共為一體。修女們也派代表參加聖言會單位的行政及管理系統，有議員參加聖言會的行政會議。在聖言會單位整體的管理及發展上，兩者共同計畫，共同議事並付諸實行。<sup>23</sup>據聖神會吳秉雅修女（Sr. Urbania Tüshaus）保留的「輔大聖言會團體與中華省聖神會合約」(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SVD Section of 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 China Province of the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1985.4.12) 中載明：「聖言會與聖神會在輔大理工學院和外語學院建立親密伙伴的工作關係。這親密的伙伴關係是共同致力於維持輔仁大學為教會在中國福傳的機構。」<sup>24</sup>合約中規定雙方以平等地位攜手合作，一同進行理工、外語兩院的各項院務之發展。聖神會承諾在行政、教學、宿舍及醫務等工作上提供必要的支援。

### （一）外語學院

聖言會負責理學院和外語學院，因此理學院及外語學院各系所之規劃與發展都邀請聖神會參與。身為國際修會，因此聖言會團體在從事語言教學工作上較具優勢地位。譬如在師資方面，相當容易找到適當的德籍、法籍、美籍和日籍等傳教士來負責各系教學。「外語學院開始時很好，因為好多外籍神父來教書，他們都是專家。」<sup>25</sup>龔士榮神父在回憶時亦證實了外語學院師資優良。在體制上，外語各系隸屬於文學院，但師資的聘用、教學的管理和經費的籌措則由聖言會負責。外國語言學系於1963年成立，下設英文與德文兩組，1964年又增加法文和西文<sup>26</sup>兩組。直到1967年四組同時升格為學系。東方語文學系則於1969年設立（1984年更名為日本語文學系）。1980年外文各系方改隸外語學院。

<sup>22</sup>羅麥瑞修女，〈輔仁大學與聖神婢女傳教會〉，收入《尋美之旅》，頁412。

<sup>23</sup>薛保綸，〈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收入《尋美之旅》，頁363。

<sup>24</sup>《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參見拙著，〈聖神婢女傳教會與新莊輔仁大學——多元化價值觀的建構〉，《學風與傳統學術研討會》，2005，頁91。

<sup>25</sup>邵台新，《龔士榮神父訪問記錄》，頁95。

<sup>26</sup>西班牙語文學系53年設組，56年與英文、德文、法文一起升格為學系。是外國語學系中唯一沒有聖神會修女服務的系所。專任教師有西籍安秀貞（教授53.9到校）、莫若蘭（副教授57.8到校）、范靜貞（講師62.9到校），兼任教師有西籍梅文彬（講師58.9）、陸佩芳（講師61.9）、孟哲慧（講師64.9）、田松韻（講師67.9）、法籍柏海星（講師59.9）、山東籍劉巴丁那（教授53.9）。莫、安、范、陸、田等位為耶穌孝女會修女。柏、孟2位為仁慈聖母院修女。輔仁西文系的發展茁壯，耶穌孝女會修女和仁慈聖母院修女的無私奉獻，居功厥偉。《私立輔仁大學教職員錄》，66.5，頁57-58；68.1，頁69。

孫志文神父<sup>27</sup>（任期 1980-1984）歐陽瑋神父（Fr. Edward Vargo, 任期 1984-1990）分別擔任外語學院院長。齊德芳神父（Fr. Franz Giet）於德文系任教並擔任語言實習所所長，提供視聽與電腦教學的完整服務。趙德恕神父（Fr. Imre Zsoldos）、文納神父（Fr. Peter Venne）、安德明神父（FR. Angel Armendariz）則各自出任法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和西班牙文系主任。聖神會在接受邀請後，鮑坤儀修女（Sr. Teresa Baues, 1913.1.4-1993.11.5）、安琪樂修女（Sr. Angela）、古怡心修女（Sr. Fidelis Goebbel）、賀永光修女（Sr. Heliena Krenn）、山崎陽子修女（Sr. Philomena Yamasaki）、裴德修女等分別受修會委派至輔大外語學院開始長期的教學工作。

為什麼要開辦外國語言學系呢？有鑑於台灣當時逐漸發展的國際經貿，與世界各國接觸日益頻繁，亟需培養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能充分瞭解對方文化傳統、思維方式的人才以因應之。<sup>28</sup>而輔仁的德文系是當時臺灣各大學最早開辦的，因為之前從未開辦德文教育科系，故缺乏適當可用的教科書、視聽器材等等，開辦工作極為艱難。創辦者需花費極大心力去製作教材。其他各系亦是如此。法文系第七屆的校友回憶道：

當年學法文的辛苦，是今日學子無法想像的：沒有課本的我們，所有的語言教材都由助教在打字機上，一字一字敲打影印出來，更遑論那本總是不夠用單薄的法漢字典。然而，我們擁有神父和修女的關愛卻是永不匱乏的」。<sup>29</sup>

就是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在神父修女等師長的關愛呵護下，各系草創、成長、茁壯。英文系的創辦，聖神會擔任重要角色。裴德修女打從一開始就加入英文系的陣容，為學生開授各種課程。在 1960 年代並與聖言會的孫志文神父一同接受政府的委託，為高中教師開辦「如何教英文」研習營。是第一位深入原住民村落研究鄒族語言的外籍女性。後來赴美攻讀博士學位，於 1986 年返臺

---

<sup>27</sup>孫志文神父德國人，在美國取得德文碩士，語言學博士學位。1965 到輔大德文系教書，1967-83 任系主任，1981-87 任德文所所長，同時建立外語學院並擔任院長。

<sup>28</sup>裴德修女，〈輔大德文系：服務與學習之泉〉，收入《尋美之旅》，頁 194。

<sup>29</sup>李瑞媛，〈走入法文系的歷史憶法文系第七屆 1970-1974 這一班〉，收入《尋美之旅》，頁 240。

繼續服務於輔大德文系。來自菲律賓的柯蘭修女 (Sr. Laetifera Colet) 教授戲劇，在當時非常罕見。在她的努力擘劃之下，戲劇公演成為輔大英文系的特色。此後更擴及整個外語學院各系，都有戲劇公演，蔚為風氣。

賀永光修女長期在理圖和英文系任職，1982 年接掌系主任並擔任「輔仁學誌」外語學部主編，除教學工作外，研究工作成果豐碩，為學界稱道。「教授文學提供無數的機會，使中國青年的心靈熟悉基督徒的觀點和價值」。<sup>30</sup> 法文或德文的基本教學技巧也給予古怡心修女好多的機會領導學生領略更多的價值。尤其是在聖經課內，他們藉著與天主聖言的邂逅而與基督相遇。山崎陽子修女的活動領域由教授現代日本文學延展至舞台上的戲劇演出。後者不僅發展學生的表演潛能，更訓練他們負責和分工合作的精神。

## (二) 理學院

聖言會所創辦的教育事業和其會祖對自然科學的愛好，及其所接受的培養訓練應該有相當的關聯。在 1875 年 8 月 5 日的會議上，楊生神父給即將成立的聖言會明確而清晰的目標：

我們的總目標是藉傳揚天主聖心的知識和愛，服侍天主和我們周圍的人。……我們特別的意向是：1) 在外教的國家傳揚信仰，2) 以聖多瑪斯的精神培植真正的科學（神學和自然科學）。……因此，我們修院的開設是為執行這兩個目標——即是為那些願做傳教士者和那些願以教師身份而準備獻身以教導傳教士者。<sup>31</sup>

楊生神父創立聖言會後，就想在傳教工作上把科學素養當作對聖言會會士們的基本訓練，希望他們秉持徹底研究的精神，來處理在傳教區所面對的種種不熟悉的情況，如新的文化語言和氣候等等。他追求更精準明確的認知和解釋，所以聖言會士自創立之後，在傳教士的培育學程中，除了神學之外，更將培育初期一年半的時間用來學習自然科學，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等學科。<sup>32</sup> 在

---

<sup>30</sup>轉引自《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廿五週年紀念》，頁 34。

<sup>31</sup>轉引自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47-48。

<sup>32</sup>魏思齊，〈聖言會及其大學事業——為落實教會的福傳使命而做〉，收入《尋美之旅》，頁 523。

楊生神父過世之前，曾重新強調聖言會傳教工作中所推動的科學精神。

我們向來較其他傳教修會更重視科學的研究精神。……天主教應在優秀的中高等教育中培育出有知識與學問，及能與當地相襯的人才。以便能為當地的民族風格帶來有效的影響力，進而使對信仰產生好感。有鑑於高等教育在日本及其他個傳教區的重要性，因此對科學專業的栽培，自一開始便是我們傳教會的第二目標。<sup>33</sup>

由於聖言會士對自然科學有特別的訓練和研究能力，這可能便是在復校時願意承辦理學院的緣由。

相較於外語學院，理學院各系在儀器設備上的需求更急迫，經費龐大籌措更為困難。當時台灣已有不少大學具有設備完善的理學院，要與他們競爭不是件容易的事。為了建立一個良好的理學院，聖言會團體努力的向外籌募經費（尤其是德國政府和教會）。1963 年先成立數學系分設純數與應數兩組，1964 年分別成立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系。1973 年數學系的純數與應數兩組分別升格為系，同年成立數學研究所，1977 年成立電子工程學系，1982 年理學院更名為理工學院。

蔣百鍊神父在輔大在台復校的工程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腳色。擔任理學院院務長多年（1963-1973），為準備師資，他立即選派二十位聖言會神父分別攻讀自然科學、外語教學及語言學。除此之外，為了籌建輔大新莊校舍、添購儀器設備，屢次赴國外募款。十餘年來積極規劃，在 1973 年退休返回德國，已使理學院和外語學院頗具規模。此後，由郝思漢神父<sup>34</sup>（Fr. Heinz Hesselfeld,任期 1973-1984）、柏殿宏神父（Fr. Frank Budenholzer,任期 1984-1990）分別接任理工學院院長之職。李嘉士神父（Fr. Michael Ricartz）、歐思德神父（Fr. Franz Oster）先後為物理系主任，白熙神父（Fr. Karl Specht）為化學系主任，扈伯爾神父（Fr. Franz Huber）為生物系主任。

<sup>33</sup>轉引自柯博識神父〈聖言會會祖楊生神父與科學〉，收入《求真之道》（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2002），頁 79。

<sup>34</sup>郝思漢神父德國人，在美取得物理學博士學位，1966 年於輔仁大學任教，1967-78 任物理系主任，1978-80 任所長，1973-84 任理工學院院長。

北平輔大女院第一屆畢業的聖神會劉英修女奉派籌備化學系。舉凡課程的規劃、師資的延聘、建築物的興建、設備的購置與勸募，劉修女居功厥偉。實驗室的器材和藥品大部分來自德國。劉修女說：「因為儀器藥品的充足，同時為了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的能力，定性、定量分析和普通化學實驗，每個學生獨自成一組。」<sup>35</sup> 為使學生們有更好的研究環境，她勤儉刻苦，也要求學生愛惜公物。60年畢業的學生回憶：「大一修普化實驗，如有弄破鼎，除按章賠償之外，尚需擔心受到劉修女的責備。總之，劉修女是不折不扣化學系另設之專屬訓導主任，學生隨時會被叫住，在走廊邊訓誡一番。」<sup>36</sup>可見對日常生活教育，修女們也是非常重視的。

白恆光修女擔任了18年的系主任，為輔大數學系盡心盡力，數學系的分組、碩士班及夜間部數學系，全是在她手上成立的。「教代數學教的既好又嚴，常常下課前測驗十分鐘，看看學生們有沒有專心聽講。她的考試題目很活。學生們為了要過她的科目很用功讀書。……給他們（打下）紮實的代數基礎。」<sup>37</sup>修女們都知道首先應獲得學生們對她們在學德專精上的尊敬，因此在專業範圍內持續不懈的努力，以滿足學生對她們的期望，然後方能使他們進一步體認到修女們奉獻生活的意義。

### （三）民生學院

民生學院的創立及其存在特別呈現出聖言會與聖神會的合作精神。此歷史可追溯至吳秉雅修女在北京輔大家政系的創辦。1963年輔大復校，吳修女又再度授命繼續領導，克服萬難，成立全國第一個家政營養學系，隸屬理學院。1965年分為家政和營養兩組。1970年因應時代環境需求，家政營養學系衍生出全國唯一的織品服裝系，由羅麥瑞修女(Sr. Maryta Laumann)擔任創系系主任。1971年家政營養學系的營養組獨立成為食品營養學系，由何木蘭修女(Sr. Evamonica Jamlang)擔任首任系主任。家政營養學系則更名為家政系，直至1986年，家政系為適應社會需要與時代變遷，改名為生活應用科系。

---

<sup>35</sup>轉引自周善行，〈懷念劉英修女——輔仁大學在台復校首位系主任〉，收入《尋美之旅》，頁322。

<sup>36</sup>轉引自周善行，〈懷念劉英修女——輔仁大學在台復校首位系主任〉，收入《尋美之旅》，頁327。

<sup>37</sup>顏一清，〈私立輔仁大學理工學院數學系系史〉，收入《尋美之旅》，頁140。

早在民國 1985 年吳秉雅修女就已經注意到未來的變化，而有前瞻性的提示：「新的營養學也將成立。……若我們沒有人有空或具備此資格，聖言會是否仍將保有權力繼續經營主導之？」<sup>38</sup>似乎應積極的儲備人才，以因應未來之需要。1994 年全國第一個民生學院正式成立。由民生學院各系所的創立可以見證聖神會修女們的魄力與遠見。

吳修女畢生致力於「提昇家庭生活品質」，是一位具有前瞻性，勇於突破與創新的教育家。她創辦輔園餐廳，創設輔幼中心，提供同學實習場所。民國 58 年，輔園的建造全由吳修女親自規劃設計監督施工，一樓為餐飲設備，二樓備有客房，當時已經具有「實習飯店」的雛形，可以看出吳修女對家政系未來在「餐旅管理」發展的前瞻眼光。1968 年積極向德國募款，才得以順利完成輔幼中心的硬體建築。輔幼中心的設立不但充分展現吳修女對幼兒教育的關懷，同時為台灣幼教界培育許多菁英師資人才。同時更是受人愛戴的生命典範，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精神的傑出傳教士。<sup>39</sup>

羅麥瑞修女說：「假如我早知道我的傳教生涯是花在大學中，並與織品服裝為伍，也許我會懷疑我的聖召。然而如今，我總算明白了，沒有一件人所關懷的事不為上主所掛慮的。」<sup>40</sup>因而於 1969 年籌備織品服裝學系，1970 年擔任第一任系主任，在台灣服裝界引領風騷，樹立典範，對織品學系、所的發展及民生學院的創立貢獻良多。「一位德國修女，因著愛而奉獻一生，因為聖神修女會需要，而奉派修習服裝碩士學位，成就了台灣綜合大學裡第一個及獨特的織品服裝系，她一輩子都著修女服，卻要使每個人穿著時髦合乎禮。」<sup>41</sup>這充分表露出羅修女的信仰引領她勇往直前，而修會的團體生活也使他深深體會，「團結合作，無往不利」的強大力量。在教學之餘，她還在輔大創立了「中國聖神福音傳播會」幫助許多教友老師、職員認識天主聖神。這件工作她持續投入了二十

<sup>38</sup> 'The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of the SSpS and the SVD section at Fu Jen Outside the tow Colleges' Jan 1985, 《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sup>39</sup> 蘇雪玉，〈輔仁大學民生學院兒童與家庭學系系史「天佑兒家」〉，收入《尋美之旅》，頁 295。「他隨時隨地都是自然表達出神職人員的誠懇，全新（心）全意投入並奉獻一生在教育我們這些外國女孩身上。」第二屆學生湯聿昂如是說。湯聿昂，〈悼念文〉，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25。

<sup>40</sup> 轉引自《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廿五週年紀念》，頁 38。

<sup>41</sup> 李寧遠，〈序〉，收入羅麥瑞、陳貴糖，《輔仁大學織品服裝教育》（新莊：輔大，民 94），頁 X。

餘年，不但親自陪伴新會員的所有研習，並帶領已陶成的會員在每月的聚會中繼續成長。

#### 四、承擔中西文化交流任務的聖言、聖神傳教會士

輔仁在新莊復校至今，四十餘年來，在校服務的聖言會團體人數眾多。聖言會會士有 60 人，聖神會修女 39 人。<sup>42</sup>

從開始聖言會團體在輔仁大學的組織結構中握有重要的行政決策權，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著一個精神傳統，單位團體裡比較重要的財務或人事決定，是由一個領導群，聖言會的神父、修士和聖神會的修女共同組成。<sup>43</sup>這兩個修會從開始就有著國際性的特色，會士們視野自然較為開闊而多元化，恢宏前瞻具國際觀。校牧田默迪神父（Fr. Matthias Christian）指出：「德國修會待人處世的精神很明顯的特別突出：有原則、有清楚的計劃、有正義感、彼此尊重，無論在授課、行政或其他工作上，都有認真與負責的態度。」<sup>44</sup>

食品營養學系一位校友指出：

本系非常重視學生的品格教育，為了把學生訓練為紳士、淑女，當時系裡開設許多特殊課程如品格教育、女範教育、禮儀等，這些課程均由神父、修女擔任。記得當時我們常頭頂書本，訓練走路姿勢。品格教育課程即是由谷神父（Bonnic）傳授兩性關係等，學生愛死了這位神父開放、風趣且大膽的授課方式，這在那保守的時代著實相當轟動。<sup>45</sup>

神職人員將西方品格教育、生活禮儀、平等的兩性關係等觀念在課堂上傳授，在那個保守的時代，確實開風氣之先。

---

<sup>42</sup>詳細名單請參見魏思齊，〈在台復校之天主教輔仁大學——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歷史淵源之二〉，收入《致善達仁》（新莊：輔大，91），頁 122-130。

<sup>43</sup>在《聖神修女會檔》吳秉雅修女檔案中 1985.4.15 即可見雙方契約有規定聖神會得派兩位代表出席聖言會單位的行政會議。但在羅麥瑞修女的文章中卻僅有一位代表參與。見羅麥瑞，〈輔仁大學與聖神禪女傳教會〉，收入《尋美之旅》，頁 460。

<sup>44</sup>田默迪，〈宗教，天主教大學與中國知識份子——聖言會單位於輔仁大學之願景〉，收入《致善達仁》，頁 188-189。

<sup>45</sup>黃瑞美，〈食品營養學系〉，《超凡入聖》（新莊：輔大出版社，民 94），頁 449。

相對的也提供學生接受多元價值觀的學習環境，在英文系任教的賀永光修女就認為，「教授文學提供無數的機會，去溝通和傳達各種不同的價值觀，目的在於豐富人生。」因此訓練出較具包容性、能多元思考的青年。輔大學生在這種極為特別，不同於當時台灣其他大學環境的薰陶下，氣質與見識卓爾不凡。

「1967年進入輔大化學系……當時輔大的洋氣、化學系美麗的建築，教會主導的理學院以及派一位修女（劉英）來指導新生，都是全新的經驗。」<sup>46</sup>在這些全然不同的經驗中學習、成長、茁壯。「從 Sr. Urbania（吳秉雅修女）處學得的日爾曼民族精神、思維、價值觀卻深深影響我的一生認真、執著的態度，常在我遇到困難時，不輕言放棄，堅持直到度過難關。」<sup>47</sup>日爾曼民族精神、思維、價值觀。確實與眾不同。

「從吳修女的身上，我看到『家政』專業的尊嚴，也體驗到『家政』專業者的性格：堅強的意志力、思辯的能力、堅定的使命感和宏觀的胸襟，這些都深深的影響著我。」<sup>48</sup>我們看到新青年的塑造過程就具體而微的出現在新莊輔大。新青年、新女性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於焉誕生。相較於北平輔仁校友來函，感謝恩師吳秉雅的教誨：

奉上五十年前您和我們家政系同學的合影，……現在，這些同學均已成材。她們有從事營養工作的，有醫務工作者，還有兒童教育者。生活在中國各地，您辛勤培育的桃李結碩果，已滿天下。……我們想念您，感謝您對我們的培育。<sup>49</sup>

西方思潮的傳入情景、聖神會（教會）對近代中國（北平輔大）女子教育的深遠影響和貢獻，又再一次的於 1960 年代（新莊輔大）重演。

---

<sup>46</sup>轉引自周善行，〈懷念劉英修女——輔仁大學在台復校首位系主任〉，收入《尋美之旅》，頁 327。

<sup>47</sup>李春芳，〈Sr. Urbania 以教育為基督做見證〉，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33。

<sup>48</sup>蘇雪玉，〈懷念吳修女——一位「家政」專業者〉，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24。

<sup>49</sup>范容給吳修女的信，2000年9月9日，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16。